

● 政治与法律

国际关系复合型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刍议

赵雅丹¹ 何奇松²

(1.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2.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行政管理系,上海 201701)

[摘要]如何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精通理论、熟稔政策具有国际眼光与专业水准的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这是目前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面临的时代要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纯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经典的三大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客观需求。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成为出发点,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跨学科研究为支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培养模式 复合型人才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教育高地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赵雅丹(1981-),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 07 级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何奇松(1972-),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1)01-0072-06

1789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念》中首次使用“国际关系”,其后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后,1919年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讲座,标志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创立。在此之前,1916年出版了格兰特的《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这是使用“国际关系”概念的第一本教科书。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知识霸权与中国话语

自从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学术性学

科在20世纪早期觉醒以来,它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态度、国家优先目标、国家利益(首先是英国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是美国的)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国家知识霸权”特征。^①随着国际交

李亚男:《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成长——一种国家知识霸权视角的分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第194页。

往的加深,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对更高层次的理论和知识提出要求。就目前的时代背景与环境而言,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求自己是一个拥有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和学术理论的大国,是一个对重要的国际问题拥有知识和学术话语权的大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并正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如果在国际关系理论见解上失语,那么就很容易受别人理论的影响甚至成为思想上的奴役。从这一点来说,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独立和解放运动。

冷战的结束,既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领域的一场革命,又是国际关系学的知识领域的一场革命。冷战时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预测到冷战会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束。理论预测的失败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义思维、结构主义思维和演进主义思维都存在缺陷。因此,后冷战的国际关系学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科和学科理论的双重自我反思,开始了对学科发展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国际关系学看作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观点经受了不同地区的学术共同体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如何提出与和谐世界理念相匹配的、反映中国人核心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打破西方垄断学术话语权的局面,这些问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面前。

当前,中国外交已经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创新点,比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安全机制的构建、新型非联盟安全合作模式、国际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等。与此同时,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相关的独特的社会命题,诸如和谐、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天下体系等概念,也为中国学者创立和捕捉中国特色的前沿议题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充分尊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传统法宝,清醒地看到中国自身发展特色问题、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同时也需要理论加以及时归纳并运用于未来的实践。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在于立足于中国崛起中所遇到的国际问题的特殊性,将理论探讨与具体的

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既注重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效果,又注重学术理论的抽象与总结。

二、国际关系学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特色

高校是国际关系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期,外交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系的设立以及其他高校地区性研究所以建立,这些机构的建立旨在满足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与外交需要,其学科基础相对薄弱。在冷战结束后,全国各大学纷纷设立国际关系学院或系、所、研究中心,博士点与硕士点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初,全国已有近40所大学有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院、系、所、中心。随着中国国力日增,逐渐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外交也日渐转型。此时,作为肩负人才培养重任的高校,如何培养植根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其中的迫切程度与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笔者认为,完整而准确地认识国际问题研究的性质、国际关系的学科性,是建构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与关键之所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概念的混乱使用,反证了笔者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快速发展。国内,国际政治学类著作和教材,或采用“国际政治”,或采用“国际关系”作书名,两个概念交替使用。但是,在学科设置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三个二级学科并列。“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概念上交替使用,而学科设置上却又独立单列,这种二元分离的现象不仅给教学与研究带来某种不便,而且也不利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王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人才发展:特点、问题与对策》,《当代教育论坛》2007年第12期。

国际问题研究大致分为政策研究和学术理论研究两大部分。这两者本质上并不冲突,但学者们的研究却往往因知识结构、学术旨趣以及个人精力等原因各有侧重。严格说来,国际问题研究与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有所差别,前者的重点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后者的重点在于学术理论性的探讨。但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基于深入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抽象和学理认知,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现实情况确实存在着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张力与隔阂。曾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助理国防部部长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就曾认为“作为现实政策运作的指导,”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多数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也只具有有限的价值”。

无独有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紧张关系。目前国内的现状是,一方面,学术研究者抱怨政府决策缺乏科学论证与辩论,学者观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政学互动不密切;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和决策者苦于难以获得学术研究足够的智力支持,对已有的学界成果不甚满意。这一现实,足以让高校充分意识到,在国际关系教学的培养模式中,应该关注政策分析与学术理论研究的平衡,人才培养与教学目标应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导。培养复合型人才,将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制订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着来自学术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多重挑战,诸如在引进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如何解决理论本土化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或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科建制的完善性、研究力量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所出版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学术规范化的自觉及本领域的学者对政府决策咨询参与度等方面,无疑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这种看似发展和繁荣的景象,却掩盖不住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尴尬,这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下失去了“中国”主体性。在过去十

多年间,在大量引进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同时,误将它们等同于科学和先进的化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许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注释性解读。第二,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严重不足。大量的所谓理论探讨的文章,落到西方理论的窠臼里不能自拔,误把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国际观念特殊性、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当作普遍规律,远离现实经验,甚至违背常识。第三,中国学界充斥着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研究具体国际问题的论文,或观念先行,套用西方理论而不顾事实;或浅尝辄止,不深不细;或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既缺乏政策的敏感性,也缺乏思想见解的深刻性,最后的结论既没有分析政策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也不具备学理分析的深刻性。第四,缺乏学术自觉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从业人员”,只是为了完成学业或职称评定的功利性目的而发表文章,而不是为了探明问题或做出学术贡献。第五,缺乏中国问题意识和学科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总体上尚无法解答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国际难题,不能解释或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遇到问题的特殊性,无法从历史经验和学术逻辑上强有力地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性论题,如“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话题,反而通常是被美国或西方的论题牵着鼻子走。

重新反思与评价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话语,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话语的必要工作。要超越“西方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西方,应当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作为历史

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

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随着其全球性扩张,以及源自于近300年来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力量。西方影响所及,原本不存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地区也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西方话语的同时,又以“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名义盲目夸大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因过分追求“科学性”而误入形而上学的偏执的倾向。“受奥卡姆剃刀理论和马赫思维经济原则的影响,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追求形式上的简单性,甚至认为简单性是真理的全部意义。为了达到简单性的理论目标,有时不惜牺牲真实性,借助理想化的抽象方法,构造各种绝对范畴,如‘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等”,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完全依据工具理性思考外交与国际关系,必然会出现观念的均质化,陷入要么臆造本不存在的假想敌,要么必然会维护现存的国际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进行合作,而对现行国际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置若罔闻。例如相信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必然会感觉到别国的强大就是自己的安全威胁;或因为只要相信国际制度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增加,必然会感觉制度下合作是相对最好的选择。然而,现实情况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国家逐步丧失了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垄断,东方国家开始逐步挑战西方国家。目前,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进一步加剧和加大了东方国家挑战的力度与范围。但是,当前东方国家的挑战,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去殖民化进程迥然不同,主要集中在关注国际秩序的改革与进步,特别是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修正与重构。

三、构建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建构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通晓理论,熟稔政策具有国际眼光与专业水准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人才,他们能够熟练运用通行的国际学术话语阐述中国的

观念、政策与立场。

建构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只有在尊重国际关系学自身学科属性、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长足发展。从研究范式角度看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尤为如此。

首先,在专业课教学中,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研究。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的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它关系到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即研究对象的基本存在方式和主要构成形式。众所周知,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及其它社会科学的主要标志,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的实质就是探索无政府状态的构成形式。就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本体论而言,它要回答国际关系的存在和构成要素是什么的问题,回答无政府状态的实体形式是什么的问题。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这倒不是说认识论和方法论不重要,而是说本体论是最为关系理论内核的部分,没有这个内核的形成,理论不具备实体,只是停留在认识途径和方法等“用”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将出在本体论的突破上。在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中,教师应须确立与引导学生树立“以我为主”的“中国问题意识”,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优秀成果的同时,注重以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气派和中国人的方法尝试建构基本理论。

其次,在国际关系教学中,强调科学方法论的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553页。

李义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同时,注重人文性与思想性。国际关系研究从相邻成熟学科领域借用有关范畴、方法与知识之后,逐渐形成本学科领域所独具的若干学科范畴。对此,我国著名学者陈乐民先生曾经有言称其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联着文、史、哲、政、经。国际政治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是非走跨学科的道路不可的。”本文已对盲目推崇行为主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批驳,不再赘言。

说到底,人类是国际关系研究活动的主体。人类行为与思维复杂性决定了国际关系本身是比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自然科学更高级的运动形式,如果脱离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特性,不顾研究问题本身的特点和要求,一味强调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代替其他研究方法,必将使国际关系学失去主体意识与应有理性,最后失去自身学科特点,变成与自然学科没有本质区别的、脱离人和人关系的单纯追求客观的理论。要避免这种现象,就要加强从人文层面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冷战于1991年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现有理论中的利益、权力和制度变量均不能完全给予解释。这启发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强的理论。建构主义就是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无法离开科学技术开拓和人文关怀。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甚至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他认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们并不排斥科学,而是围绕科学,将实证方法与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描述相结合。其最终目的在于,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将既继承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注重国际关系研究的客观化、定量化,又更加注重从文化视野,从人的发展的人文主义维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学,最终使疏远的科学世界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

最后,在国际关系教学与科研实践中,突出“中国问题意识”,即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世界,用中国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用中国人的立场去融入世界,用中国人的声音去阐述世界,最终在教学与研究中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文化为载体,反映出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因此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各国千差万别的对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文化的差异。当前国际关系中,中国与西方在人权、主权等方面的矛盾与摩擦也正说明了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从本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研究和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建立自己国际关系理论和制定对外战略的文化渊源与主要载体。近年来,国内国际关系界中引人注目的学术趋势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想传统中,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想历史资源与世界观依据的研究正在不断增多。诸如北京大学的叶自成教授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外交”思想的探索,阎学通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有系统地对先秦诸子或其主要文献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归纳,以及哲学界的赵汀阳从“天下”角度对世界政治制度的探讨。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种种不成熟之处,但是其为丰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努力和贡献。

(责任编辑:肖舟)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1页。

Discussing on the Cultivation Scheme for Compound-ability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AO Yadang , HE Qisong

Abstract: How to cultivate the compound-ability professionals , who master theory , are familiar with policy and characterized with Chinese feature , is the theme of current era faced by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purely rooted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 especial realism id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y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Chinese school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mode for compound-ability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oriented with problem-consciousness and supported with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cultivation scheme , compound-ability professionals

(上接第 53 页) 业经营活动与规制的不一致成为一种常态。为了突破中央规制的限制 , 一些企业选择了与地方政府结盟的方式。本文对此现象没有给予价值观的判断 , 仅仅对其行为进行客观分析。研究发现 : 第一 , 在规制快速变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 企业在遇到中央规制的强大压力时 , 可以利用地方政府的“双向代理”角色 , 通过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 , 塑造对自

己有利的环境或者影响中央政府 ; 第二 , 企业与地方结盟方式存在四种类型 : 地方政府默许、地方政府援助、地方政府引诱、地方政府主导 ; 第三 , 企业结盟地方应对中央的取得成功 , 需要在经营活动做出科学设计 , 在结盟方式上做出恰当选择。

(责任编辑 : 余风)

Allying local government to respond to central government : reasons, classification , and success mechanisms

LI Yugang , ZHANG Teng

Abstract: Chinese enterprises face double constraints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ecause of the two-way agent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 enterprises under strong pressure brought by central government can strengthen the interest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 and finds four types of allianc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 acquiescence , assistance , inducement , and domin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success mechanism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central regulation.

Key words: enterprise , central government , local government , regulation; alliance